

談談美國漢學的新方向

孫康宜*

最近二十多年來，全球化的趨勢已使美國傳統的漢學研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有關全球化，有些漢學家從一開始就十分贊同，但也有人持批判的態度。在這篇短文裏，本人不想做任何理論上的判斷，只想從自己的親身體驗出發，發表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我是一九八〇年代初開始在耶魯大學執教的。在耶魯，我發現「漢學」的系科歸屬有別於美國的其他大學。在其他學校裏，「漢學」(sinology) 研究及教學大多籠統納入一個「區域研究」(所謂的 area study) 的系中——一般說來，在美國，有關中華文化的課程(無論是中文和中國文學還是中國歷史和人類學)全部歸東亞系；它有時被稱為「東亞語文和文明系」(如哈佛大學)、有時被稱為「東亞語文和文化系」(如哥倫比亞大學)、有時被稱為東亞研究系(如普林斯頓大學)。獨有耶魯與眾不同，這裏不以「區域研究」劃分系科，而是按「學科研究」(disciplines) 瓜分所謂「漢學」。這就是說，教中國文學和語言的人——如 Hans Frankel (傅漢思) 及本人都屬於東亞「語言文學系」。教中國歷史的人——如 Jonathan Spence (史景遷) 及余英時(一九八〇年初余教授仍執教於耶魯)——屬於歷史系。教社會學的 Deborah Davis 屬於社會學系。而教人類學的 Helen Siu (蕭風霞) 則屬於人類學系。同時，耶魯圖書館中書籍的排列也大多反應了這種按「學科」區分的歸類方式。比如，只要有關於陶淵明的書，各種語言的版本都擺在一處，而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和普林斯頓葛思德圖書館，則把所有的中文書籍單另外編目和上架收存。

記得初到耶魯，對這種以「學科」分類的方式，我還不太適應。這是由於從前

* 孫康宜，耶魯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教授。

在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班受了正統的「漢學」教育，一直把「漢學」看成一個獨立的領域，而現在得重新調整「領域」的界定，頗有離散孤立之感。從前在母校，東亞系的大樓裏積聚了各種漢學科目的教學研究人員，文史哲不分家，經史子集，教授們各顯其能。但到了耶魯，我走出自己的辦公室，只見得到少數教中國文學的兩三位同事，走廊上所遇者多為英文系、俄文系、阿拉伯文學系等其他語種的教授。若要找研究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教授，還得找到校園的另一角，實在讓人感到不便。（當然，耶魯設有一個「東亞研究中心——稱為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那是讓不同科系的老師和學生們申請有關東亞研究方面的經費，以及舉辦各種活動的大本營；但它並不是一個所謂的系）。

後來在耶魯教書久了，才逐漸發現，這種以「學科」為主的教學方式也有它意想不到的好處。就我個人的體驗來說，首先有益於廣泛瞭解其他語種的文學。許多不同領域的新朋友都不斷給我新的啟發，而我從前學的又是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本來就有基礎，如今正好更上一層樓，更加擴展了視野。後來，我應邀加入「文學科目」(literary major) 講座，更熱心投入「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 的跨系活動，與校園裏許多不同科系的人都常有見面討論的機會。

不知不覺中，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學術道路已邁向「全球化」的方向。與此同時，我也注意到其他許多美國大學的東亞系——雖然並沒改變它們原來的結構——也慢慢發展出不少跨系的新研究領域了。當然，我並不是在說，耶魯那種以「學科」為主（而不以「區域研究」為主）的傾向直接造就了美國漢學的新方向；但耶魯的特殊教育結構顯然與美國漢學這二十多年來的全球化趨勢不謀而合。

據我個人的觀察，從前美國（和歐洲）的傳統「漢學」是把中華文化當成博物館藏品來鑽研的。在那樣的研究傳統和環境中，凡用中文寫的文本都成了解讀文化「它者」的主要管道，所以早期「漢學」大多以譯介中文作品為主，「音韻學」(philology) 尤其是漢學家們的主要研究科目——因為他們想知道從前唐人是如何朗誦唐詩的，宋人是如何吟唱李清照詞的。總之，那是一種對「過去」的東方抱著獵奇的求知興趣。可想而知，當時漢學家們的學術著作只在漢學界的圈子裏流行，很少打入其他科系的範圍。但隨著美國比較文學範圍的擴大，約在一九八〇年間，美國漢學漸漸成了比較文學的一部分；因此有些漢學家一方面屬於東亞系，一方面也成了比較文學系的成員。尤其是，一向享有盛名的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MLA, 現代語文學會) 開始設立「東亞語文分部」(Division on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這樣一來，「漢學」也就進入了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然而剛開始時，所謂中西比較還是以西方文學的觀念為基礎，因此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大多偏重中西本質「不同」的比較；例如研究中國文學是否也有西方文學中所謂的「虛構性」(fictionality)、「隱喻」(metaphor)、「諷喻」(allegory)等課題。另外有些年輕的比較文學兼漢學家，他們則向這種「比較」的方法論提出挑戰，因為他們認為，強調本質差異很容易以偏概全。

自從一九九〇年代以來，全球化促使中西文化交流日漸頻繁，許多美國大學所舉辦的國際會議都開始邀請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日本等地的學者。而來自這些東亞地區的長期「訪問學者」(visiting scholars)也逐漸在美國校園裏多了起來。他們在美國的圖書館藏書中看到了許多國內已失傳的資料，因而大開眼界，在學術研究上多有創獲。同時，他們也對美國漢學家們的嶄新視角發生了興趣，把大量的漢學論著譯介到大陸，編輯出版了一系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之類的譯叢。（其中《北美中國古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由樂黛雲、陳珏主編，一九九六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臺灣則開始了一連串的漢學會議，陸續邀請國際漢學家參加（包括二〇〇七年八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舉辦的「記傳、記遊與記事——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不用說，這些會議文章出版後，對文化交流都十分有用。此外，這些年來，在美國出版的許多英文漢學專著也先後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地流行。值得注意的是，也就在這同時，美國漢學家們開始踴躍地到東亞地區做研究，屢次和中國大陸和臺灣等地的同行有深入交流的機會，於是就有了共同的語言（當然這也跟美國政府和基金會逐漸增加這一方面的研究經費有關）。事實上，東亞地區同行的研究成果在近年來已成了美國漢學家們的必要參考資料，所以著名的刊物——如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東亞研究學刊》）——也開始登載有關漢語著作的書評。在這一方面，耶魯大學出版社特別做出了貢獻，因為它陸續將中國學者的著作翻譯成英文出版，使得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能開始在西方漢學界中以英文的形式流傳。（當然，這種英譯的中國學術作品，在美國的讀者群還是極其有限的。相較之下，國人對於英文漢學著作的中譯更加看重，甚至到了爭相出版和購買的程度。）

但無論如何，近年來由於中西方深入交流的緣故，人們所謂的美國「漢學」，已與大陸和臺灣（或香港）的中國文學文化歷史研究越走越近了——可以說，它們目前已屬於同一學科的範圍 (field)。特別是這十多年來，美國各大學的東亞系的人

員組成更發生重大變化，華裔教授的比例越來越多。（必須附帶一提的是：二、三十多年前，當筆者開始在美國執教時，華裔教授只是教授群中的少數之少數，而且大多是來自臺灣的移民。但這幾年來，來自大陸的傑出年輕學者，在獲得美國「漢學」的博士學位之後，經常成為美國東亞系爭取應聘的對象）。這無疑反映了中國人逐漸走向世界舞臺、以及西方人更加看重東方人的新趨勢。尤可注意者，在目前還在進行中的《劍橋中國文學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十七位執筆人中，就有八位是移民自臺灣、中國大陸、及香港的華裔「漢學家」，另有一位則是土生土長的美國華人。這在二、三十多年前，是絕對無法想像的事情。

然而，從不久前《南方週末》的「漢學」專輯中（2007年4月5日）可以看出，國人（至少是中國大陸的讀者們）對於美國漢學的新趨勢似乎所知甚少。他們仍然是以一種仰視「洋人」的態度來評價美國的漢學家，以為美國漢學「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結論」都與中國國內的研究「不一樣」，似乎二者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其實，如上所述，今日的全球化已使我們進入了一個多元的時代，同是研究中國文學文化和歷史，每個學者（不論在中國大陸、臺灣、或是美國）都代表著各自不同的聲音，中西之間固然還有區別，但同時也在出現新的融合。對於西方的「漢學家」，國人只需以平常心對待，不必特別抬高他們的身價，也不應出於自衛的排斥心理而妄加輕視。